

GDP：“慢下来”的张弛之道

“在全世界，人们都叫我 GDP，我的英文全名是 Gross Domestic Products，中文叫国内生产总值。我是一把尺子，衡量着所有国家与地区的经济表现。我是一个重要的数字，但任何数字都有它的陷阱。我反映经济增长率，但并不反映经济运行的质量，不计算经济增长背后的各种成本。”以上是 GDP 先生的自白。

记者在采访中发现，尽管漂亮的 GDP 数字下暗藏陷阱，但是一些地方仍然形成了强烈的“GDP 崇拜”。这是因为按照传统的政绩评价体系，GDP 数值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地方官员的政绩得分。

目前，GDP 色彩正在逐渐被淡化。根据广东省委十届八次全会披露的目标，未来五年内，全省 GDP 年均增长 8% 以上。这个数字略高于全国预期目标，低于国内很多省份的预期目标，也比广东“十一五”规划设定的 9% 增速有了明显下调。

GDP 增速“慢下来”，背后隐藏着怎样的深意？

慢，不是退步

被称为“世界工厂”的东莞，其一举一动都备受关注。“‘十二五’期间，东莞 GDP 的年均增幅将定为 8%。”日前，东莞市委书记刘志庚的话，引起了外界的种种猜想。

在过去二三十年里，东莞就像一列高速奔跑的列车，保持着 GDP 年均增长 18% 的速度。当列车遭遇“金融危机”后，速度开始减慢。2009 年，东莞经济经历了 GDP 增长 5.3% 的低位运行。2010 年，东莞的 GDP 增速恢复到 10.3%。

金融危机这两年，是东莞改革开放以来 GDP 增幅最慢的两年。面对压力，刘志庚形象地打了个比方：“就像一列高速行驶的列车，已经奔跑 30 年了，你不放缓速度好好检修一下，给它加油，以后怎么来继续加快发展？”东莞主政者的言语之中，向外界传递出一个信号，即东莞逐步淡化 GDP，更加注重结构是否得到调整，经济质量是否得到提升。

与东莞一墙之隔的深圳，也开始重新审视“深圳速度”。深圳市市长许勤坦言，前 30 年，“深圳速度”名扬全国，创造了年均 GDP 增长速度 25.8% 的奇迹。但现在土地、资源、环境已经严重制约深圳发展，必须主动转变发展方式，变“深圳速度”为“深圳质量”。不仅要看 GDP 总量和增速，更要制订考核指标，比如单位面积产出、单位 GDP 能耗。

多年的头号经济大省广东，开始以更加科学理性的眼光看待 GDP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、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此前就坦言，“我不太看重 GDP 数据。把精力花在调结构上、花在转型升级上，现在数据不好看，将来数据会好看。”

实际上，即使按照 8% 的增速计算，5 年后广东的经济总量也将达到 6.46 万亿元。“现在广东最大的任务不是经济增长要有多快，而是增长的质量和未来的增长点在哪里。”有专家表示。

而经济增速的下调，并不意味着退步或是停滞不前，而是给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留出空间。从长远看，暂时的“稍慢”是为了将来的“更好”和“更快”。

慢，要忍住阵痛

GDP 放慢脚步，为经济转型留出了空间。

“面对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，我们不转不行。面对国内百舸争流的竞争态势，我们慢转也不行。面对广东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，我们盲目转更不行。”2010 年 5 月 20 日，汪洋在《人民日报》发表署名文章表示。

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，是一个不断探索的过程。汪洋举例道，一个小池塘换一次水，可能只要几小时；一个大水库换一次水，可能就要十天半个月。广东是经济大省和人口大省，不亚于一个巨型“水库”，并且处于全国这个特大“水库群”的重要位置，牵一发而动全身，实现经济发展方式全面转变，需要一个长期过程。

在长期艰巨的转型当中，各地政府更要忍受住 GDP 减速的阵痛。这是因为结构调整有自身的规律，有周期。汪洋说道：“比如科技

投入，技术转让，这个增加并不可能反映在近期增长上，技术变成产业，变成产品销到市场上，打开销路有个过程。所以结构调整不一定马上见效，有的可能是明年见效，后年逐步见效，甚至于是五年十年以后才见效。”

以东莞为例，目前正经历着转型的阵痛。东莞市财政局预算科副科长李树峰对比道，东莞市 2008 年财政收入增长 12%，2009 年增长 10%，2010 年财政收入的预算目标是增长 6%。“这个数字有两重含义：一是国际金融危机影响的体现，二是产业结构调整的表现。”

此外，地方政府还要防止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当作政绩工程，不切实际地一哄而上，搞一刀切、照搬照抄。汪洋表示，如果不具备资源禀赋和经济技术条件的地区，无视经济发展阶段面临的外部约束，出于政绩冲动奉行“有条件要上，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”的错误理念，盲目搞所谓转型升级，必将导致想吃“馅饼”，却掉进了“陷阱”的危险。

选择“长痛”还是“短痛”，选择眼前利益还是长远利益，选择 GDP 政绩还是科学发展，这考验着地方领导的政绩观、眼光和魄力。

慢，是要科学发展

“十二五”期间，让 GDP 增速放缓，让地方政府缓解做大 GDP 的冲动，也是为了让广东科学发展、更加有质量地发展。

值得关注的是，目前有的地方政府已经开始有意识地调整发展节奏。在 2010 年的广州“两会”上，发生了一场耐人寻味的对话。当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，出乎意料地提出了 GDP 增长 10% 的预期目标。“目标定得低，不利于广州的发展。”不少人大代表、政协委员直言，广州会因此被天津、深圳等城市超越，丧失全国第三城地位。

“为了迎接亚运盛会，广州有三大任务：一是对空气的整治，这一整治还包含了结构调整，200 多家达不到环保要求的企业都要停产。二是要对珠江进行整治等。三是人居环境整治。”广东省委常委、广州市委书记张广宁回应道。而整治的背后，关键是经济发展方向的转向。“我们提出 10%，就是给这些整治留有余地。”张广宁表示，“我们宁可把速度放慢一点，也要完成任务。”

汪洋曾表示，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，这是经济工作的“头号工程”，要集中力量打好这场“硬仗”。“我们不片面地追求 GDP，如果真的是速度低一些，把结构调整过来了，就是别人超过我们了，但是我们有发展的后劲也是值得安慰的。”

以新兴产业为例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是一个复杂、长期的过程。与传统发展模式“大干快上”“捡到篮里都是菜”不同，发展

战略性新兴产业是一场“不同的竞赛”，固然要看谁搞得“快”，但更重要的是看谁选择得“准”，发展得“好”，有效益、可持续。

业内人士表示，目前战略性新兴产业还是“星星之火”，自然在现阶段比不了早已燎原的传统产业。不仅如此，许多时候还需要政府给予更多的财政、政策支持。如果地方政府过度追求 GDP 一时的数字增长，反而会压抑住新兴产业发展的冲动。

慢，要告别“GDP 崇拜”

“十二五”期间，对于各地政府而言，最重要的是当地官员能否告别“经济增长的急躁症”，静下心来调结构、转方式，而不是单纯追求 GDP 数据的漂亮。

对于 GDP 增长，汪洋曾有过一段精彩而科学的论述。“我们有的 GDP 数字很好看，但并不是增加了社会财富，而是浪费了社会财富。”汪洋谈道，“比如讲，建大桥，这是 GDP，让大桥塌了、拆了又是 GDP，再建一次大桥还是 GDP。这样干了三次 GDP，浪费了大量的社会财富，但是真正形成的财富就那一笔。”

然而，政绩考核就像一根指挥棒，决定着地方政府的未来政策走向。张广宁表示，如果政绩考核还是“唯 GDP 论英雄”，那么地方政府表面上会把转方式捧得很高，实际上仍可能紧盯速度，看重规模。

粤北山区一位县长告诉记者，该县为生态县，从上级政府对该县的考核指标来看，总分是 130 分，其中经济发展占了 55 分，生态环境、社会发展、人民生活则各占 25 分。GDP 发展速度、工业增加值发展速度等，都成为考核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。“如果原有的考核机制不改变，基层官员就不得不把 GDP 作为首要的追求。”

汪洋透露，为解决转变发展方式的机制问题，广东会在干部考核上做出重大改变。在新的考核办法中，经济增长的指标只占整个考核指标的不到 30%，而且不同地方不一样，将会区分优先发展区、重点发展区、生态发展区，其中最高不超过 30%。

降低 GDP 考核比重，才能从根本上倒逼干部转变观念和发展方式，才能让他们真正告别“GDP 崇拜”。

(2011-01-30 15:27 南方月刊)